

古代红河地区的交通开发与中越贸易

范淑萍

(云南红河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古代红河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交通开发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红河地区与越南相邻,为了发挥这一空间优势,历代统治者积极开发边境交通,加强与越南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元明清时期,是中越交通开发及贸易的重要时期,为近现代中越贸易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红河地区;中越贸易;红河航运;马帮运输;驿传制度

[中图分类号]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1-0017-03

交通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边交流的基础。古代的交通开发与政府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中越毗邻,对外贸易的地理位置显赫,双方在古代一直保持着边境贸易往来。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持中越之间的边贸关系,积极进行交通开发,为中越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一、元代以前的中越交通开发

红河地区的交通开发历史悠久。早在《后汉书·马援传》中就有记载:东汉建武十九年(43),镇守交趾的伏波将军马援向朝廷上书说:“从糜泠(今越南河内西北永富省永安、福安一带)出赉古(今蒙自县)出益州(今昆明晋宁县)……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从糜泠水道出进桑(今云南河口县)王国至益州赉古县,转输便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今屏边一带)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

从糜泠到进桑是一条水道,也就是红河水道,且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连通交趾的要道。

《晋书·陶璜传》记载:“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在东汉交通的基础上,陆路、水陆相配合,有效地提高了红河地区的交通运输能力。

唐樊绰的《蛮书》也有相关记载:“从安南(今越南河内)上水至峰州两日,至登州两日,至忠诚州(今越南越池)三日,至多利州两日,至奇富州两日,至甘棠州两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赉栅四日,至贾勇步(今河口县)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并是水路……从贾涌步(今河口市)登陆至矣符馆(今屏边县城)一日。从矣符馆至曲乌馆(今屏边新现)一日,至思下馆(今蒙自县城)一

日,至沙只馆(今个旧倘甸)一日,至南场馆(今建水县)一日,至曲江馆(今建水曲江)一日,至通海城(今通海县城)一日。”这是一条水陆并行线,从安南走水路二十五日到达贾涌步;改为陆路七日到通海城。这条线路成为后代驿站设置的重要参照,如曲江馆、通海城,明清都在此设驿站,进一步开发了当地交通。

《新唐书》的记载更为详尽:“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诚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今越南甘塘),皆生獠也。”站点设置增加,是交通发展的表现。“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今河口),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说明从今河口至安南都是水路。“又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间不容砮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今屏边)。又五十里至禄索州(洗马塘),又十五里至龙武州(新现),皆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倪迟顿(今蒙自),又经八平城(鸡街),八十里之洞澡水(倘甸),又经南亭(建水),百六十里至曲江,剑南地也。又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拓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其中古涌步至通海八站,有568里的路程均在红河地区境内。与《蛮书》相比,从天数的估算改为具体的路程说明,本身就是交通发展的表现。其中的交通站点在前代基础上得到延续。

二、元明时期中越交通及贸易的巩固拓展

元代红河地区通往越南北部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原来基础上加以巩固并有一定拓展。汉代以滇池为中心,

建立了朱提道、灵关道、永昌道、牂牁江道、麋泠道交通干线。南诏、大理时期云南交通进一步发展,以大理为中心,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今印度),东南至交趾(今越南),北至成都,西北至西藏,南经缅甸、老挝、泰国通于海。元朝统一全国后,在推行中央政策的同时,调整了治滇政策。统治重心从滇西大理逐渐转移到滇中的中庆(今昆明)地区。云南政治中心亦从大理迁到中庆,从而改变了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辐射和政治影响力,其中与越南的联系尤为突出。中越交通沿袭了唐宋云南连通越南的路径,它北起中庆路(今昆明市),途经晋宁、江川、通海、建水、蒙自,沿红河入越南。

元代的站赤制度是中央王朝对红河地区交通开发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元代在历代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站赤,形成一个比较畅通的交通网络。站赤不仅设于元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内,而且在其周边属国也有设置。《元史·地理志》记载:“自安南大罗城(今越南河内)至燕京,沿途约一百一十五驿,计七千七百余里。”越南境内设置有站赤,对中越之间的贸易往来无疑具有推动作用。站赤的设置,虽然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但对当地交通的开发以及对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明代,统治阶级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在重要的地方设置驿站,客观上促进了交通开发。“明兵平滇,设云南布、都、按三司,在元的基础上设府、州、县。广开卫所,调军户屯驻,设立机构,择地安置,防守冲要,以资镇慑地方,捍卫边疆。”其中,红河地区是连接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的重要通道,故中央王朝尤为重视。“永乐十年(1412)二月,设云南临安府之倘甸驿、蒙自县之蒙自驿、梨花旧市驿、宁远州之者隆驿。”其中的倘甸驿在今蒙自县倘甸。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考证,梨花旧市驿,“以方位考之,梨花驿站应在今蛮耗,盖自此可航行,为水陆码头”,应该在梨花江,即红河边上的蛮耗,利用了红河的水利之便。在临安境内还设置了“新建驿,洪武十四年建;曲江驿,永乐元年建;宝秀驿,洪武十六年建;阿迷驿,景泰七年建;矣马洞驿,天顺三年重建”。并且驿站与铺哨相结合,配有“石屏铺、龙泉铺、阿迷铺、罗台铺、蒙自铺、十里铺”等等。明代在交通沿线广设驿递、铺舍,保证了道路的安全畅通。与越南相连的地方开设官方驿道,有利于红河地区的对越贸易。

明代对越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朝贡贸易,一是民间贸易。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元年到崇祯十年(168~1637),越南派遣使节达到79次,是中越友好往

来与交流的重要时期。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中越贸易的基础。期间,中庆经蒙自至大罗城(今越南河内)的道路成为中越贸易的重要通道,红河地区蒙自等地的交通枢纽作用得到体现。中越之间的民间贸易主要实行货物之间的互通有无。据《明史》记载:明初,重兵入云南,本省农产不足食用,从越南转运粮食至滇东区域以供军食。^⑪中越商道,成为双方联系的重要纽带,即使军粮的供应也依靠此道。大量官吏、贡使、普通商贾和边境小民也积极投入到中越贸易中。“安南国贡路,旧率自广西,今因钱能交通,故欲自云南而使臣往来多挟私货,入边贸易,借此营利,其带货物又要边民为之运送,殊为边境之苦,故一度申禁”。^⑫其中,临安府治所在地建水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它自古就是云南通往越南的交通要道,是“安南通天竺道”中“通海城路”和“步头路”的咽喉地段,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东南通道,与滇西的博南古道同为当时的交通枢纽。

三、清代中越交通及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红河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商业活动能力加强,人口大量增加等因素,促使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中越贸易继续发展。

清朝,红河航运成为中越贸易的主要通道,促进了中越双方的民间贸易。“海防至河内海船运一日,河内至老街舢板运十二日,老街至蛮耗舢板运七日,蛮耗至蒙自牲口运三日;蒙自至云南府牲口运九日,共计四十日。”^⑬红河航运和马帮运输相结合,交通很是便利。红河地区主要的马帮路线有:(1)滇桂线:由云南蒙自至广西百色,沿右江至南宁,计程492公里,再由南宁至北海用船运。全程马帮驮运共需52天。此为云南通桂、粤、香港陆水联运的重要通道,也是大锡外运的主要通道。(2)昆明—蒙自—蛮耗线:这是一条省内运输路线,由昆明9天到蒙自,蒙自2天到蛮耗,全程马帮运输11天路程。由蛮耗木船运输7天到越南老街,老街到河内木船2天,河内到海防海船1天。^⑭这条线路主要沟通了中越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成为红河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交通线。

清代在国内设置驿站的基础上,把驿站逐渐发展到边境,进一步沟通了与越南等地的联系。“乾隆二十四年(1745),设南西卡、漫止卡、山腰卡、河口卡、漫期卡、漫莪卡、漫来卡。”^⑮进一步加强了边境地区驿站的设置,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清政府对越贸易的重镇主要集中在滇南临安、开化等府所属地区。而河口与越南接壤,是中越贸易的主

要通道。滇越之间的贸易,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蛮耗,设有关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坝洒,立市卖钱。交人喜于得钱,蒙局因为利。”所以朝廷准许“一年二次委官赴蛮耗,纳价领钱,随到随即发回”。^⑩这是清代官方铜钱出口越南的重要记载。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开化府的马白(今马关)设税所,同时在河口设汛,特准边民商贩往来。中越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据道光《开化府志》记载,当时销往越南的货物主要有井盐、铁制农具、丝织类、瓷器、中药材、牛皮、麻布、铜器、纸张、蓝靛、神香、调料等生活用品。越南输入云南的商品就比较少,主要是粮食等,且多为零星记载。

清光绪九年(1883),迤萨人王科甲等到越南莱州地区经商,打通了红河地区与越南民间通商的通道。^⑪

期间,河口与越南通商贸易的货物主要有鸦片、土布、藤器、药材、茶叶、甘薯、槟榔、红山梅、山萃。^⑫这些出口商品大多为滇南土产,少部分来自内地各省份,经滇南转运出口。其中,丝织品大多产自四川,部分产于云南本省,经川、滇商人长途贩运入滇后出口越南、老挝,直至转口到东南亚。越南商贩溯红河上保胜,经河口镇再沿汤泉(今屏边)至蒙自,达拓东城,船队、马帮络绎不绝。出口商品有布匹、绸缎、纸张、铁锅、烟茶、药材等,进口商品有大米、水果、槟榔、胡椒、砂仁、竹木及海产品。

总之,古代红河地区的交通开发促进了中越贸易往来,加强了两国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红河地区在中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为近代红河地区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前沿奠定了基础。

[注 释]

酈道元:《水经注》,卷 37《叶榆水》,《云南史料丛刊》,1998 年版,第 1 卷,第 311 页。

《晋书》卷 57,列传第 27《陶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唐·樊绰:《蛮书》,卷 1,《云南境内途程第一》。

《新唐书》卷 43 下,志第 33 下,地理 7 下,中华书局标点本。

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记〉云南史地丛考》,载《云南史料丛刊》,1998 年,第 3 卷,第 192 页。

方国瑜:《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1984 年版,第 26 页。

《明太宗实录》,卷 81,中华书局标点本。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第 1183 页。

正德《云南志》,卷 4,志 4。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83 页。

⑪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 12 册,列传第 14,卷 126,《沐英传》,第 48 页。

⑫《明宪宗实录》,卷 141,中华书局标点本。

⑬《新纂云南通志》卷 144,商业考 2,进出口贸易。

⑭《云南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卷 16,1998 年版,第 70 页。

⑮《开化府志》,卷 8,兵防。

⑯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冶金史论文集》,1965 年印,第 56 页。

⑰王建生:《红河人开辟东南亚商路》,《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第 81 页。

⑱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云南文史集粹》,第 5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1 页。

(上接 13 页)

⑭明代山阳县为淮安府府治所在地,即今江苏省淮安市,参见《大明一统志》卷 13《淮安府》,第 207 页。

⑮《明会典》卷 118《兵部一·官制》,卷 122《兵部五·诰敕》,第 613 页、629 页。

⑯《明史纪事本末》卷 21《亲征漠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年版,第 335~336 页。

⑰《明宣宗实录》卷 65,宣德五年五月戊寅条。

⑱李文根据《明史》推测这次战役是征“曲先叛番”,误。明朝所谓的“征沙漠”,是专门针对蒙古而言。曲先等羁縻卫所,明朝将它们归入“西番”之中。

⑲《明史纪事本末》卷 30《麓川之役》,第 453 页。

⑳《明英宗实录》卷 164,正统十三年三月壬寅条。

㉑张贵女婿靖远伯王璘,即王骥长子,袭其父伯爵。参见《献征录》卷 9《兵部尚书靖远伯王公骥神道碑铭》。

㉒《明史纪事本末》,第 455~457 页。

㉓《大明一统志》卷 87《孟养军民宣慰使司》。

㉔《大明一统志》卷 87《南甸宣抚司》。

㉕《明英宗实录》卷 175,正统十四年二月乙巳条。

㉖《明会典》卷 228《上二十二卫》,第 1122 页。

㉗《明会典》卷 134《京营》,第 685 页。

㉘《大明一统志》卷 1《顺天府·大兴县》。